

名为“免费赠送游戏皮肤”实为“隔空盗窃”

青说法

□ 本报记者 罗莎莎
□ 本报通讯员 刘施洋 程方苗

游戏皮肤免费赠送，是玩家福利还是陷阱？犯罪分子欧某等人利用部分网络游戏皮肤价格高、获取难的特点，瞄准没有经济来源又渴望限定皮肤的未成年人，以“免费赠送游戏皮肤”为诱饵设下“杀鱼盘”，通过远程操控软件实施盗窃。截至案发，该团伙利用相同手法诱骗多名未成年人，涉案金额20余万元。

近日，由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这一案件一审宣判，被告人欧某等5人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至五年二个月不等，并处罚金。目前，判决已生效。

“免费皮肤”不免费

小王是一款网络游戏的忠实玩家。2024年11月，他用母亲手机玩游戏时，游戏内队友给他发了一条消息。对方自称是游戏主播，只要关注他的直播账号，就能赠送小王一套限定游戏皮肤。小王平时听同学说过，有些游戏主播会为了涨粉而搞福利活动，禁不住诱惑，小王很快关注了对方。

“关注后，他告诉我只要下载一个‘游戏插件’，就能免费领取皮肤。”小王回忆说，“起初我不信，但看到原本一起组队、没有游戏皮肤的两名队友都换上了新皮肤，就相信他真是主播，能送我皮肤了。”就这样，小王下载了对方指定的“游戏插件”，但实际上这是个带有远程控制功能的软件。

□ 本报记者 梁平妮

信息采集不可越界
教育公平需守底线

近日，山东省东营市第一中学在2026级新生入学信息采集中，设置家长职务、家庭车辆品牌型号、购置价格、车牌号等采集项目，引发社会热议。针对公众关切，当地教育局迅速调查核实，责令该校停止相关信息采集，删除已采集的超范围信息，并在全市开展入学信息采集情况专项排查，切实保护学生及家长个人信息安全。

新生尚未入学，家庭隐私反而先被“摸底”，这般操作实则越界。面对争议，校方解释，采集车辆信息是为了管控校门口违停，询问车价用于贫困补助申领甄别，理由未免牵强。违停管理依靠交警疏导和动线规划，贫困生认定有严格的核查机制、流程，全员采集此类信息实属多余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此类超范围采集信息并非个例。近年来，学校、幼儿园过度采集学生、幼儿家长信息的事件时有发生：有的小学要求填写“家长的擅长项目或可提供的社会资源”；有的幼儿园要求家长报名时提供工资流水、经营流水等。这背后，暴露出部分学校、幼儿园边界意识缺失，管理思维功利化等问题。

学校过度信息采集，为何屡屡触碰公众敏感神经？教育是最公平普惠的公共事业，过度采集家庭隐私信息，容易催生身份标签、家境攀比问题，甚至滋生“看家长、辨学生”的不公平现象。这种做法不仅背离校园育人初心，涉嫌侵犯公民个人隐私，更会侵蚀教育公平根基，触碰政策与法律的双重红线。

事实上，2022年，教育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明确，应当采集学生基本信息、家庭住址及家长姓名、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，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。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，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和诚信原则；民法表明，处理个人信息的，应当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原则，不得过度处理。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法律规定，都为校园信息采集划定了清晰的界限。

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，校园本应拥有最纯粹的环境。无论是学校，还是教育主管部门，都应在职责范围内，守护校园环境，真正让教育回归育人本心。

随后该“主播”又要求小王打开母亲微信，添加其事先准备好的微信账号，哄骗小王所有操作都是为了赠送游戏皮肤。在两小时的通话中，对方通过软件顺利控制了小王母亲的手机，在窃取了身份证、银行卡、验证码等关键信息后，将微信、银行卡内的1.4万元分批转走。当小王察觉微信钱包余额异常并试图联系对方时，这名“主播”早已消失无踪。

自知闯了大祸的小王赶紧把被骗的事告诉了母亲，小王母亲立即报警。2024年12月，公安机关循线追踪，将该团伙成员抓获归案。

是诈骗还是盗窃

2025年3月23日，案件被移送至宿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检察机关审查认定，该团伙借助游戏语音交友系统，筛选并接触防范意识薄弱的未成年人，并以赠送游戏皮肤、装备等为诱饵，诱骗未成年人下载带有远程操控功能的软件，在获取被害人手机操作权限后，该团伙通过远程控制软件直接操控被害人手机，窃取敏感信息，并远程转移被害人财产。

为减轻罪责，欧某等人辩称，他们只是骗取未成年人钱财，根本算不上偷。该案承办检察官郭健则认为：案件定性不能只看手段，必须结合犯罪目的进行综合考量。一方面，犯罪嫌疑人以赠送游戏皮肤为由欺骗未成年人下载远程控制软件后，控制被害人手机翻找身份信息、银行卡资料等，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取得被害人的财物。虽说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，但这只是窃取钱财的手段行为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不能完整描述整个犯罪过程。

另一方面，本案虽有欺骗未成年人下载

警惕有针对性的“隔空盗窃”

郭健表示，这起“隔空盗窃”案件暴露了许多家庭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认知存在盲区。在防范网络电信诈骗的宣传中，家长时常会叮嘱孩子“不要给陌生人转账”，却忽略了犯罪分子可能会诱导孩子下载远程控制软件，自己控制手机完成转账。

正如本案中，孩子一旦点开链接、安装插件，就等于把家长手机的操控权拱手相让。对此，郭健建议家长告诉孩子：网上任何要求下载“插件”“加速器”“辅助工具”的说辞，无论理由多么诱人，都应直接拒绝。

本案中，犯罪分子反复要求孩子“不要告诉妈妈”，其目的就是要造成孩子与家长之间的信息隔绝，利用孩子的无知，在家长不知情

的情况下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软件、提供验证码，完成“隔空盗窃”。她提醒家长，不妨给孩子立一条简单易记的底线——凡是要求瞒着父母的事情，都是坏事，正规的网络活动，从不忌讳家长。

事实上，小王并非第一个被骗的孩子。在之前的几起案件中，有的孩子因为害怕被家长责骂，迟迟不敢说出实情，等到家长发现时，资金早已被转走。在办案过程中，郭健注意到，多名涉案被骗孩子事后出现了失眠、焦虑甚至抑郁倾向，身心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她提醒家长，如果发现孩子被骗，切忌一味责骂，应先安抚孩子的情绪。稳住情绪后，迅速断网关机、挂失银行卡、保留聊天记录并报警。越早行动，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事后，家长还需留意孩子的心理状态，多谈心、多安抚，如果发现孩子出现持续的情绪低落、睡眠障碍等问题，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帮助。

互联网时代，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保护日益受到社会关注。《法治日报》记者了解到，聚焦未成年人涉网犯罪、网络侵害多发现象，2021年，宿迁市检察机关打造“青少年网络漫游e家”法治研学基地，通过答题竞赛、风险检测、情景模拟等趣味互动环节，创设可观、可感、可触、可用的网络安全法治教育场景。

“这起案件已正式纳入法治研学基地的案例库，并附有详细的案情分析和防范指南。”郭健表示，希望通过这一身边人的案例，让孩子们在研学活动中深入认识到通过网络“隔空盗窃”的手段与危害，对“天上掉下来的馅饼”等诱惑保持警惕，从而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。

第一道结，是重新学会信任。我联系了县社会心理服务协会，请专业心理咨询师介入，为小红制定长期心理干预方案。第一次见面，她把自己裹在宽大的校服里，问什么都不答。我们没有急着让她开口，只是每周固定去看她。心理辅导员跟我说：“心理创伤不是靠苦口婆心就能好的，要走进孩子的心，得先让她习惯陪伴，建立信任，再让她慢慢相信，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可怕。”

陪伴持续了一个多月，转机出现在一个细节里。小红喜欢画画，起初她的画全是灰暗的色块，没有人物，也没有门窗。有一天，她忽然在画的角落里涂了一小片黄色。“那是什么？”我问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“太阳。”后来又有一次见面，她主动开口：“阿姨，能带我回学校看看吗？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知道，孩子心里那扇紧闭的门，正在缓缓敞开。

第二道结，是重返校园的坎。复学绝不是把课补上那么简单。我依托永丰县“护未”中心工作平台，联动团县委、县教育局和小红所在的学校，组建了由法官、心理辅导员、团干部、教体干部和教师组成的联合帮扶小组。研判会上，班主任说得很实在：“功课落了能再补，可孩子要是迈不过心里那道坎，回到学校也学不进去。”

此后，帮扶小组反复打磨细节，为小红制定了细致的返校方案：学校安排骨干教师上门辅导，帮她把落下的功课一科科捡回来；门来，几位要好的同学主动给她写卡片，约她一起上下学；团县委组织小型集体活动，让她重新习惯与同龄人相处。

第三道结，是家庭教育的转变。收案后不久，我就请家事调查员对小红的家庭情况全面摸排。调查员告诉我：“她的父母常年加班，平时多是爷爷奶奶带她，家里关系不算和睦，她和父母以前就经常吵架。”

心理辅导员分析：“许多父母迷信‘打是亲，骂是爱’，把指责和训斥当成了教育方式，‘我也是为了你好’常挂在嘴边。可这不

青案卷

□ 赵文娟 曾嘉明

3月21日晚上，我收到一条很长的微信，是小红的母亲发来的：“孩子今天放学回家，主动跟我讲了班里的趣事，一边说一边笑。那个开朗的女儿真的回来了，谢谢法官！”

我回想起一年前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时的场景，她全程低着头，回答问题时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她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：“她以前很活泼的，出了这个事之后就像变了个人。我们跟她说话，说不上两句就要吵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

2025年，正在读初中的小红不幸遭受社会闲散人员侵害，作为承办法官，我见证了案件审理全过程，最终，被告人依法受到严惩，案件在法律层面已经审结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少年审判的“第二本卷宗”才刚刚翻开。对小红来说，一切还远没有结束。

判后回访时，我走进小红家，眼前的景象让人揪心：出事后，她再也不敢迈进校门，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更让我难受的是她父母的态度——“当初就让你少跟那些人来往，现在弄成这样，怪谁？”母亲一提起这事就抹眼泪，话里话外都是指责；父亲闷头抽烟，只是叹气。本该是孩子依靠的家，如今却成了压在她心上的另一块石头。

那一刻我明白，一纸判决只能惩罚施害者，却接不住这个往下坠的孩子。要把她拉回来，得解开她身上的三道“结”：心里的伤、返校的坎、家中的怨。

第一道结，是重新学会信任。我联系了县社会心理服务协会，请专业心理咨询师介入，为小红制定长期心理干预方案。第一次见面，她把自己裹在宽大的校服里，问什么都不答。我们没有急着让她开口，只是每周固定去看她。心理辅导员跟我说：“心理创伤不是靠苦口婆心就能好的，要走进孩子的心，得先让她习惯陪伴，建立信任，再让她慢慢相信，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可怕。”

陪伴持续了一个多月，转机出现在一个细节里。小红喜欢画画，起初她的画全是灰暗的色块，没有人物，也没有门窗。有一天，她忽然在画的角落里涂了一小片黄色。“那是什么？”我问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“太阳。”后来又有一次见面，她主动开口：“阿姨，能带我回学校看看吗？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知道，孩子心里那扇紧闭的门，正在缓缓敞开。

第二道结，是重返校园的坎。复学绝不是把课补上那么简单。我依托永丰县“护未”中心工作平台，联动团县委、县教育局和小红所在的学校，组建了由法官、心理辅导员、团干部、教体干部和教师组成的联合帮扶小组。研判会上，班主任说得很实在：“功课落了能再补，可孩子要是迈不过心里那道坎，回到学校也学不进去。”

此后，帮扶小组反复打磨细节，为小红制定了细致的返校方案：学校安排骨干教师上门辅导，帮她把落下的功课一科科捡回来；门来，几位要好的同学主动给她写卡片，约她一起上下学；团县委组织小型集体活动，让她重新习惯与同龄人相处。

第三道结，是家庭教育的转变。收案后不久，我就请家事调查员对小红的家庭情况全面摸排。调查员告诉我：“她的父母常年加班，平时多是爷爷奶奶带她，家里关系不算和睦，她和父母以前就经常吵架。”

心理辅导员分析：“许多父母迷信‘打是亲，骂是爱’，把指责和训斥当成了教育方式，‘我也是为了你好’常挂在嘴边。可这不

法庭外的守护

仅对孩子成长无益，甚至本身就可能是孩子心理问题的根源。”循着这个症结，我和心理辅导员先后11次同小红的父母长谈，跟他们聊一个朴素的道理：孩子受了伤，最需要的是家里的暖，而不是耳边的怨。教育孩子，首先要理解孩子，知道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

从那以后，家里的指责声渐渐少了，饭桌上的话渐渐多了。小红的父母开始学着理解女儿的内心里，在工作之余尽可能抽出时间去陪伴她，感受她内心的波澜。

“我好像知道以前为什么总和她吵架了，我会慢慢学着当一个合格的妈妈。”一次心理辅导结束时，小红的母亲感慨地说。

经过半年的努力，小红重新背起了书包，赶上了落下的功课，还参加了班级活动。那个曾经把头埋得很低的女孩，终于又抬起了头。

小红的经历，并非个例。未成年被害人在案卷中往往很少出现，出于保护隐私，避免二次伤害的考虑，他们总是以“某某”的身份，隔着纸页诉说本该远离他们这个年纪的苦难；小小年纪的他们，也大多不愿走进法庭，可恰恰是他们，最需要关爱和保护。司法若止步于对被告人的裁判，很难说完成了任务。

那么，法院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？自打我走上少年审判岗位，这一直是我和同事们反复思考的问题。随着办案经验的积累，我的认知也在不断加深：每一个被迫卷入刑事诉讼的未成年人，身上的伤痕总有痊愈的一天，心里的伤疤却容易伴随一生；而他们的父母，往往缺少正确的家庭教育知识对孩子的共情能力。一句“我们也是为了你好”，可能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没有正确的引导和干预，这些孩子很可能走不出困境，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。

刑罚可以惩戒罪犯，却无法消除被害人心里

沿着这样的思考，这些年我们依托永丰县作为欧阳修故里的文化根脉，取欧阳修晚年自号“六一居士”与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的双重寓意，成立“六一工作室”，打造“法护六一”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。

优化资源配置，构筑“专业化”审理模式。我们实行涉未成年人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“三合一”审判模式，成立专业少年家事审判团队，关联案件由同一团队办理；同时配备少年家事圆桌法庭和一家事调解室，营造温馨的家庭场景，将“坐堂问案”转化为“圆桌谈心”，缓解对立情绪。

构建联动网络，形成“全局化”护未合力。依托永丰县护“未”中心平台，整合政法机关和团县委、教体局等单位的力量，变司法保护的“单打独斗”为“六大保护”的“协同发力”，延伸审判职能，为困境中的孩子提供复学、救助等针对性帮扶；同时，面向社会聘任家事调解员、家事调查员，同县心理服务协会签订合作协议，在少年审判中积极引入心理辅导，同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。

法槌落下，审判便已结束；但对少年法庭的法官来说，判决书不是句号，而是另一程守护的起点。庭内的卷宗可以合上，庭外的“第二本卷宗”，需要我们用更长的时间去书写——孩子心里的伤口，得用心用情去守护、陪伴，直到真正愈合。案件虽结，守护无期。

（作者分别系江西省永丰县人民法院佐龙人民法庭三级法官、江西省永丰县人民法院五级法官助理）

从一场“翻车”开始的法治副校长之路

我是法治副校长

□ 池福有

我是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区分局横街派出所的辖区民警，也是横街镇中心小学的法治副校长。走村入户十几年，处置过各种鸡毛蒜皮和惊心动魄的案件。可每次站上讲台，面对齐刷刷仰着的小脑袋，我还是会紧张。这种紧张，跟办案子不一样。办案子讲究个水落石出，跟孩子打交道，你得把自己变成一束光，照进他们心里去。

给未成年人普法的难处在于，你讲得口干舌燥，底下的小脑袋早飞到操场上了。要是把话简述给孩子们呢？让他们自己去采访，去记录，去讲身边的法治故事——同龄人写的文章，比我唠叨一百遍都管用。说白了，就是让孩子们从“被普法”变成“去普法”。

我的法治副校长之路，是从一场“翻车”开始的。5年前第一次讲课，PPT做了十几页，结果不到10分钟，前排一个小朋友直接打了个大哈欠。

我脑子里只有一个词：完了。后来想通了——孩子们听不懂“行政拘留”这些“天书”。从那以后，我彻底换了方法。

把防溺水课搬到水岸边去。有回巡查撞见大人带着孩子野泳，一个男子还不服气。我把他叫到一边，轻声讲了几年前这里出过的事。他脸上的倔劲儿没了，旁边小孩吓得大气不敢出，这堂“现场课”比讲100遍“六不准”都管用。反诈骗课，我把真实案子编成故事，上来就问：“游戏大神让你发妈妈的验证码，发不发？”底下炸了锅。等讲完后果，喊得最响的几个孩子眼睛瞪得溜圆。

工作久了，我发现孩子身上的“疙瘩”，线头还是攥在家长手里。有回半夜接到报警，男孩带着哭腔喊：“警察叔叔，我爸妈打我！”赶到他家一看，作业本散了一地，家长拿着扫把叉着腿，就为作业磨蹭这点事。我让孩子先回房间，拉着他爸坐到沙发上。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满肚子委屈：“一晚上就做了三道题！”我问了一句：“你小时候考不及格，家里揍你，你改了吗？”他沉默半天，摇了摇头。我又从家庭暴力讲到望子成龙，他终于憋出一句：“教育这门课，太难了！”孩子那边也委屈。我蹲下来告诉他：“爸妈不是不爱你，是太着急了。下次能不能先给叔叔打电话？”他眼泪汪汪地点了点头。那天晚上我替他们定了一条“家规”：辅导作业，谁先急眼谁去阳台冷静5分钟。后来碰见他爸，他黑黑笑着用，现在辅导作业前先深呼吸三次，家里总算不用戒尺了。这事让我铁了心：家长这堂课，必须补上。

总有人问我，工作已经忙得脚打后脑勺，还往学校跑，图什么？去年冬天，一个女孩在走廊上堵住我，往我手心里塞了颗糖：“池叔叔，谢谢你上回讲的反诈课。我奶奶接到骗子电话，我按你说的拦住了她，好几千块呢！”说完扭头跑了。我把那颗糖攥在手里，站了很久。守护一个孩子，有时候就是某堂课上一句不经意的话，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里，涟漪荡开很远。

做法治副校长这些年，我没什么“成绩单”。无非是开学讲第一课，放假前唠叨安全，排查校园周边隐患，接到电话就去跟“问题学生”谈天。日复一日，就像种地——浇水、施肥、除虫，急不得，也懒不得。如今孩子们老远看见我就喊“池叔叔好”，这声招呼，比什么表彰都受用。我愿意继续穿着这身警服，做一个给孩子们撑伞的人，守护每一朵花，慢慢地，稳稳地开。

（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横街派出所民警）

我是法治小记者

□ 郑致瑞

我叫郑致瑞，是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中心小学五年级的学生。最近，我的书桌抽屉里，多了两样“宝贝”——一张法治小记者的聘书和一只穿着警服的小熊玩偶。每次拉开抽屉看见它们，心里就暖暖的，像有一束光照了进来。

这束光，是从7月8日那天照进来的。主持人说，法律就像遮阳的树荫，引路的灯塔。我在心里悄悄重复了一遍，忽然觉得这两个字没那么远了，它好像就安安静静地站在我们身边。

揭牌那一刻，我屏住了呼吸。贺卫所长和李益明书记一起揭开红绸布，“法治小记者基层采访观察点”牌匾亮了出来，台下掌声响得格外热烈。

当主持人念到我的名字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快步走上台。叔叔们把聘书递过来，池福有警官弯下腰，轻轻把一只警服小熊放在我掌心。小熊圆头圆脑，穿着迷你警服，怀里抱着一颗小红心。我低头看着它，忽然觉得手沉甸甸的，聘书不重，小熊也不重，但这份信任，真重。池警官站在台上，警服笔挺，笑起来温和又可靠。我想：以后他就是我们法治路上的“专属守护神”啦。

这份信任，真重

聘任仪式刚结束，池警官就给我们上了一堂防溺水安全课。我本以为会是一串“不准”“禁止”，没想到他一开口，把全场拽进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里。他讲去年暑假去水库巡查，远远看见几个大人带着孩子在野泳，水面上的游荡圈花花绿绿。他把人喊上来后，有个大人还不服气，说就在边上泡泡能有啥事。池警官没有发火，把这人叫到一边，轻声讲了之前那里出过的事。

礼堂里很安静，我坐在座位上，后背有点发凉。去年夏天，我也缠着爸爸带我去水库玩水，爸爸没答应，我还生了两天闷气。那天放学回家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跑过去抱了爸爸一下。爸爸一脸莫名其妙，我却半天没松手。

池警官最后看着全场说：“你们每一个人，都是家里的宝贝，谁都不能少。”我把这句话记在了笔记本的第一页。

现在，我是法治小记者了。以前我觉得法治是大人的词，离自己还远得很。现在我知道，法治也可以是我笔下的故事，是我要传递的声音。我的“任务”才刚刚开始——池警官是给我们撑伞的人，而我，想做那个把伞下的温暖，台上的光，讲给更多人听的小讲读者。

未来，我会紧跟池警官的脚步，用心观察，认真记录，把身边的法治小故事一篇一篇写下来，通过法治小记者平台，把平安和守法的种子搬进更多同学和家人的心里，让法治的阳光照进我们每一段成长的路。（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横街镇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）